

试论沈从文创作边城世界的 现代文化意识

王文捷

(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320)

摘要:沈从文的历史“链索”观使其将现实变革意识的基点建立在过去与现代关联的深层文化意义上,其重构边城“古典”文化范式的向度在于社会的未来。古典道德意识的美善表达渗透着现代社会伦理道德的合理性基础,其道德意义的“秩序和理性”在局限中显示了现代社会基本的最低与最高道德要求的联结。边城人类生命形式的展示和思考折射出生命的现代意义和未来可能性,其对人生形式理想的提升和期待同其道德理想必然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种子”。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世界;现代文化意识

中图分类号:I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2)05-0065-07

对文化传统乃至文明范式作出文学的表现,是历史过程中人类保存与传递文化的形式之一。过去作家或文化人的思想在现代的互动和延续,总是使丰厚的文化资源在被延续和发展的同时,也与现代指归保持某种一致性。对于最能代表民族本土传统文化的边城世界而言,它作为沈从文思辨传统文化和反思现代社会的结果,可以说是其独特的审美方式、文化观念及生命意识的明确表达。本文试深入作家构建边城世界文化生活模式的思想意识,去探究这种“古典”文化对造就现代社会与文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意义。

沈从文创作对现代意义的关注首先根源于作家明晰的现代感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与生活体验是

形成其独特的创作意识的基础。在经过青年时代人生与社会的严酷洗礼之后,他对生活的感悟已是相当的深刻乃至非同寻常。作为一位“明白现象,不为困缚”的具有现代化人格的“智者”[1](《烛虚·二》,264页),面对当时湘西民众的生存现状以及现代都市人类的精神面貌的现实,他自然会思考社会的变革和探寻理想的现代文明的存在方式。这种思考的表层焦点是民族的命运和发展走向,而深层次里则包含传统文化中民族人类在新的现代世界应有怎样的活化状态,亦即在时代人事的变迁中文化传统经过某种解释重构后可能呈现的现实(现代)意义。

沈从文曾经指出,就当时中国现代社会里怎样“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而言,是需要“能用思索的人就目前的环境重新去打算重新去安排”,把大部分人的信仰力量“倾心到一个崭新的希望上去”的[1](《废邮存底·一周内给五个人的信摘抄》,299页)。

收稿日期:2002-05-09

作者简介:王文捷(1967—),男,四川省营山县人,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

在沈从文的眼中,处于现实中的国家仍在进行着巨大的悲剧,民族“年轻一代仍然担负着异常沉重的负担”。这一切都是需要文学家“从一个更新的观点上给他们以鼓励,以刺激,以启发”,在社会发展的将来方能“在残破国土上有勇气来重新努力收拾一切”[1](《学鲁迅》,233页)。因而他抱着“由理想证事实”的信念,领会了广义的现代人文主义的精神要旨,从此思考着现代国家民族自由、民主、理想化的社会文明范式。

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站在现代地平线上,目光注视着本民族年轻的人类在忧患中挣扎的基本品质和现状,开始把笔“贴近土地”的“旧的毁灭和新的生长”,乃至民族“新旧交替的一切问题”[1](《学鲁迅》,233页)。他经过痛苦的思索而决定要用“人”来重新写作“神话”。这个“神话”不仅“综合过去人类的抒情幻想与梦”,还“综合过去人类求生的经验,以及人类对于人的认识”[2](《北平的印象和感想》,130页)。在我们通常的认识观念中,历史的“过去”常常是“落后”或“不当”的代名词,但实际上这种联结“过去”的链环里往往蕴含着维护稳定文化的有生力量。于是,我们看到文化历史在沈从文眼里具有了源泉的意义。如果说现代“光明”是从古代情感和观念的承续上自然发展的,现代进步是靠与历史的联系同时也超越这种联系而取得,那么“过去”历史在时代的境遇中有了向现代和未来开放的可能性意义。沈从文由此“把时间放长眼光放大”之后,在其创作中将“现世成份”加上“过去幻梦”重新处理,紧密衔接“历史文化”和“时代发展”[3](《收拾残破》,296页),其创作“边城世界”生发出“对未来社会有所倾心”的倾向与指归是自然而然的。

在沈从文眼里,民族历史文化是“一条其长无尽的链索”,每个人在“了解历史”的同时自己也必愿“成为将来历史”[1](《给一个广东朋友》,341页)。因而在他的现代意识观念中历史蕴含了冲破时间矛盾的一种努力,亦即捕捉现代的同时可回返具有生命力的过去,并利用其每一方面来发展有关现代的观念。现代与历史文化在这里从时空观上达到了血脉相通。但我们还知道,后世对历史文化的承载都是一种重建,时代的价值内涵与意义的增生是无法避免的,因而对沈从文的创作而言,现代民族的生活苦乐,为生存和发展“所作合理挣扎”乃至“遭遇的挫折”和“勇敢的爬起”,“否定当前的现实”与“追

求未来种种合理发展过程”的叙述,以及在不断的分析检讨与解剖之中“对于明日社会作种种预言”并“鼓励其实现”[1](《学鲁迅》,232页),这一切都可以放置于一个深厚民族历史文化背景的边城世界里。在这种活化了文化的“过去”人事中,我们看到作家主体创作意识里充满了创造性的生机与活力,从而使传统文化在由古到今的凝结乃至超越中展示出了动态的鲜活意义。

对于沈从文边城世界这“一组文字”而言,从一方面看它是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借边地“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来“为人类‘爱’字做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1](《从小说习作选》代序,45页)。但是另一方面,作者“主意”却并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那么作家的边城世界创作意义还应是体现在别的更深的层次上。我们注意到沈从文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剪裁和章次”人生的客观现代世界,见到的是“所抱的崇高理想”“在事实中遭遇限制,挫折和毁灭”,他在困惑与痛苦里曾希望“逃避到一种抽象之中”[2](《白魔》,124页)。这种“抽象”不仅仅存在于作家一些虚空的意识流里,它更在于作家对苦难而世俗的现实的反叛和逃避,从而使沈从文期望以“一种高尚勇敢的情绪”置入其文学创作,力求使文学“向一个人类庄严道德原则追求的兴趣和勇气”[1](《给一个广东朋友》,342页)靠近。于是沈从文创作边城世界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回眸闪耀出了绚丽的光芒。那些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时代人性立场出发的文化精神内容,如优美的伦理规范、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传统文化所包容的一切,在作家主观梦象的奇特感悟中开始产生着创新的现代意义。在他交织着希望与幻灭、曲折和起伏的思索过程中,其历史意识和文化情感已经融汇了期待现代社会发展的焦虑和困惑。于是,那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创造性的生活方式,成为了作家对于社会人生“由斗争求完美的一种理想”[3](《新度邮存底·十》,34页)的建构和表达。

这种指向现代世界的历史文化建构理想和沈从文深厚的民族本土意识联结在了一起,民族历史文化实际上也体现为一定意义的民族本土历史文明范式。沈从文描绘的边城世界充满了湘西泥土的气息,其营构的具有独异代表性的乡村人事呈现出一

种社会古文明模式。作家详尽仔细地铺陈了湘西本土人民一种原始古朴的社会生活环境,以及其中人们的爱憎哀乐与生活情感式样。而正是对这种相处的客观世界的社会文化模式的“牧歌情调”的实践,带来了作家主体对现代社会的文化阐释和主观理解。如果说本土现实的特殊性蕴含着现代世界的普遍性,那么无论是对于边城社会的“古文明秩序”的重构,还是对这种社会文化中独特的人生形式的设计,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向这种文化范式讨教的意味,来达到对现代文化范式进行解释的目的。于是,沈从文在对民族历史自信的反思之中,通过边城世界里人们质朴刚健、勇武坦诚、轻利重义,对自然虔敬合一等心态和品格的表象,审视着本土社会环境中与历史文化相互交织的某种优美的外化形态,并将其深层观念与现实社会做出适度的嫁接。这种表达使他揭示出饱受摧残蹂躏的民族本土客观实际情景与文化理想的对比,同时也揭开了本民族现代性转变中那些过去与现代文明的某种深蕴的“断裂”、“差异”和“异变”等意义。边城世界与现代社会这种对比性意义折射出作家主体反思后的召唤和希冀。他对边城世界的“打算和编排”在于“利用逐渐富饶的民族历史情感”,使“现代文化”和“古典文明”重新融结,从而让“旧有的光辉”再次“燃烧于更新创造中”,进而对社会潜在地产生深刻的影响,“广泛浸润于政治哲学和实际生活”,以使现代民族发展“转入一种新机”[3](《关于北平特种手工艺展览会的一点意见》,312页)。由此看来,“乡下人”沈从文特别注意的是本民族现代化过程的客观性和具体特别性。这种特有的本民族现代问题情结是在对本土问题深刻自觉的敏感性和现实感中产生的。在顾及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内在性和独特性时,作家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使其创作不停留于世象表面而深入到社会文明深层结构关系,尤其是这个结构中内部各种文化要素精神内涵的现代张力。一方面,边城世界的精心构建首先认定了古代历史文化含有的合理有效意义,使“这个民族在过去一份长长的岁月中”的历史文化的基本意义得以确立;另一方面,作家在其中强烈地“注入自己的生命意识”,希图通过一个经过修正转化的传统社会模式,即通过“运用人类智慧光辉遗产”来思考现代中国民族问题,从而在这块地面“创造新的历史”[3](《艺术周刊的诞生》,215页)。

沈从文的现代“新历史”实实在在地从民族自身的过去历史文化情景中获取资源,因而他的创作中抛弃了现代社会文化的复杂内涵,把文化探求与观照的主要落脚点放到了现代道德观与生命观(人生形式)的建构意义上。虽然这种现代性探求失之片面,但他对意味深厚的传统历史文化的紧密依存越来越显示出重要而深刻的价值。

二

现代道德意义其实指称的主要是一种社会道德与现代社会之合理性目标相适应的道德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人类的伦常心理和义理精神的文化存在状态是一个关键。撇开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其它方面意义不论,而从伦理学的层面和角度观照,沈从文聚焦于民族当时在落后的现代生产力状况下的国民道德精神状况,体现着他务实的文化性格。他首先认识到了现代社会道德最基础的道德合理性意义,即在社会的现代发展中怎样的道德规范才是基本的与合理的。而这是一个一直困扰人类社会现代性发展的突出问题。

沈从文的都市小说揭示了现代都市的道德精神和社会心理的变异和堕落,而普通乡村民众在“‘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时同样出现了“残存的那点素朴的人情美也快消失殆尽”[4](《〈长河〉题记》,2页)的严峻状况。现代中国社会失范的变迁已经带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典优秀道德自身延绵的危机,同时还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道德迷失和紊乱,以至于实际的客观社会状况“总不能令人愉快”,“这个现代社会”被一些人“共同弄得到处都是丑陋”。沈从文进而分析产生这种紊乱“有种种原因”,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过去的道德哲学不健全”,许多人为了攫取点“小小利益”,就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谦退、牺牲、为团体谋幸福、力持正义”等意义“完全疏忽了”[3](《中国人的病》,349页)。产生这个问题还有更为潜在的原因在于,社会的现代转变要求与文化道德精神的发展和谐同步,而道德发展与社会前行严重脱节而未能实现这种同步。对这种发展“异步”和道德失范后果的认识,促使沈从文必然对现代社会道德发展的困惑作出关注和反映。

而关注与反映现代民族这种病态的道德状况,实际上映射出了我们民族在现代变革时代重要的道

德事实和问题。针对现代社会与道德客观的事实和问题,沈从文认为如果要改善这种现状,现代人与社会首先应当有个“理想的标准”,至少容许“在文学艺术上创造那个标准”,他希望文学创作成为“推进历史的工具”[3](《收拾残破》,296页),达到这一目的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取决于“社会多数学人对于历史文化广泛深刻的‘认识’”[2](《水云》,276页)。如果说这种“认识”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即把对传统的“返本开新”作为解决现代社会道德衰微难题的重要途径,那么将重返“古典”作为探索现代道德一种较为理想的出路便显示出了沈从文的先知先觉。我们知道“古典”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生活实践的“情景”中蕴藏着现代道德资源,从其中可以寻找到现代社会可资借鉴的宝藏,加以更新的动力则可重铸现代人缺失的道德形式[5]。这样,现代道德在现代变革中有了历史的依托和充分自足的模式,从而也就具备和充满着现代再生意义的期望与活力。

沈从文这种认识使其把目光注视到传统湘西历史美德重造的“边城”世界。他要好好处理这样“一种历史”,亦即“属于受时代带走行将消灭的一种人我关系的历史”[2](《水云》,294页)。这种“人我关系”象人事一样“一切都应当美一些”。如果说“美应当是善的一种形式”,那么这个现代社会中的人类还应当有一个美善的道德伦理模式。于是在沈从文笔下边城人与社会的和谐氛围里,作家除了表现家庭亲属个体之间密切的社会关系而外,更为强调的是具有社会普遍性及合理性的伦常之理,自然人本精神与自发的社会行为规约在优美的文明范式中契合着现代社会必备的伦理结构特点。他认为,“儒道治国”在现代社会是可能的,民族传统精神尤其是儒道哲学中富于实践理性精神和具有人民性的部分,便被他艺术地再现于湘西世界的道德形态。沈从文曾认为自己表面上“思想信仰也许同现代社会制度皆显得十分冲突,不能相合”,但实际上却有一种“更合理更谨严的伦理道德标准”控制和支配他,因而他要在作品中表现出“对于旧制度习惯的反抗,向未来社会伦理道德努力”[3](《新文人与新文学》,169页),因而他笔下的优美社会道德风尚的历史性“返祖”,其实也可说是一种道德的现代缅怀。

这种现代缅怀使沈从文在创作边城世界时“已形成了一种感觉”,即从某种“必然性”和“共通性”

的理解中去见“道”。它的完整处恰如“一种思想系统”[3](《新废邮存底·二十五》,73页),其中必然包涵对现代社会道德合理性的核心即秩序与理性的思想要义的关注。但对沈从文的认识而言,秩序是“人与人共同活下来时谋和平安全,减少一点纠纷,使人与人更容易相处的一种东西”,在社会生活中它虽然能够“控制人的行为”,但归根到底其核心之处还是“由人类行为支持它”[3](《论读经》,341页),那么影响人类行为的道德就在其中仍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沈从文持此看法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在深层次的历史文化过程和影响之中,人生的道德大多数已经“无固定性”,并且“常随人类需要立一个标准”,其价值又恰好取决于那种“无绝对固定性上面”,因而道德规范的选择和树立对生活秩序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而对于作为道德另一核心的“理性”的含义,沈从文认为生命中的“情感”比“理性”要“更具势力”[2](《水云》,267页),同时“道德就个人而言即代表理性”,亦即理性仍然是道德的个人化行为和思想的表现,同样受道德的支配而没有固定与绝对的意义,因为“对个人虽为牺牲,对社会人类则为利益”。同时就道德本身而言,它“同法律政治一样”,在本质不变的同时“形式得常常变动”,而在社会行为中我们“只要明白它的变动性”,在感受道德变化的过程里获得一种相对意义的“理性”,那么“运用道德来治国平天下,并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3](《论读经》,341页)。在这里,沈从文意识里的秩序和理性实际上是道德意义的秩序和理性,其根本意义与现代道德秩序和理性的实质是有较大差异的。把社会道德重建的意义提升到社会重建方法论的相当高度,显示着作家个人现代意识的局限性但也并非毫无意义。

那么从沈从文重建边城世界道德形式的文化意识中考察,这种“古典”道德意识为现代道德合理性的探寻提供了几方面的意义。它首先从普遍的社会生活情形中确认出社会道德最普通一般的要求和基础。“边城”社会描绘了自由亲爱的社会关系和自然纯美合乎人本的平民生活,肯定了人与人平等的权利和互助的行为,即每个人自觉遵守社会基本道德准则,享受自由的同时承担相应的义务,以积极态度参与社会合作并践约自己的社会角色,形成现代人与社会起码的正当合理的“基本道德”。其次是在创作中确立了一个最高信念的自在自为的伦理

观,亦即一个最高要求的社会道德理想。沈从文把“美丽、清洁、智慧”的“美与善”意义作为人类社会需要的最高“德性”[1](《〈篱下集〉题记》,34页),故而“完美的个体”与“追求至真至善至美”便是他道德理想的最高层面。许多人物如龙朱(《龙朱》)、老马兵、雉送(《边城》)等的塑造从某个角度表达着对完美高尚道德风范等“人类幸福的幻影”向度的努力,蕴藉着现代与未来的道德伦理某一方面完善的目标。第三,推崇以文化阐发的方式促进现代社会道德文明的实现。沈从文承认自己崇拜和倾心人类优美“德性”的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促使他不断地“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抒写优美的文化传统和文明规范,“表现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3](《尽责》,347页)。他期望用“简明合理与现代精神不相违背的出版物等广播流传”的“新的方法”,使道德教化的结果“有力而易于收效”。实际上,如果说“硬性”的法规是现代社会的根本,那么以文学描绘出的边城世界里那种“软性”的德约同样不可或缺。他期望一面用美的“社会生活”来培养好的道德观念,一面用“法律”来辅助教育所不及,使现代青年生发树立一种“新国民性格”[3](《论读经》,344页)。理性与情感协调互补,社会合理规范与人的理想道德信念协调互补,道德的最低要求和最高理想的合理联结,这就是沈从文在“怀古的幽情”里为关心“现社会变动”的人们提出的重建现代道德的热切之方,并期待着这种建构“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6](《〈边城〉题记》,226页)。

三

沈从文“相信人类的热忱和正义”,确信“爱”的道德能重新“粘合人的关系”,通过对民族古典文化的重构作出现代社会合理道德意义的阐发,表达出的实际上更是“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2](《从现实学习》,301页)。他希图用“人生光热做成的种种优美原则”,来形成人生的“新的势能,新的秩序和憧憬”,在牧歌笔调中寻求“为富饶人类生命得到合式发展”时的“一点保证和象征”[3](《收拾残破》,304页),明晰地展示了作家企望的“热忱健康的人生观”。

人生形式作为“生命最庄严一部分”,同样也是“浸润泛滥于一切社会制度,社会思想和文学的社

会组织”,从而“形成历史过去又决定人生未来”[1](《〈看虹摘星录〉后记》,50页)。而在社会历史意识和规范无形而漫长的压抑下,生命状态已经产生异变,呈现各种不同的非正常形式。沈从文早已了解湘西民族在客观现实中个体生命的“种种挣扎”和“遭遇挫折”,这种生命形式包含着“不易设想痛苦怕人的生活”,仍有人“用血和泪在同样的情形中打发日子”[7](《编后记》)。其生命个体包涵着封闭保守与愚昧落后的一面。但沈从文追求的是美善形式的道德形态,而追求美善的一种象征便是“文化的向上”,即能够于不断趋向文明化“向上”的现代视野中去审视人类生命的存在。同时由于“理解生存则触着生命本来的种种”,结果“可能更明白庄严的意义”[1](《〈看虹摘星录〉后记》,49页),因而在边地环境成长的沈从文无法避免与割舍对本土民族生命形态的关注和理解,并促使他准确思索和把握生存状态下生命应有的崇高意义。在其对都市与乡村社会作出深入了解之后,城乡两种客观存在的生命情态都使他感到失望和无奈。

沈从文逃避到某种“抽象”中必使他思索期求一种理想的生命观,而对现代城市虚伪扭曲人性的厌恶则使他倾心于自然纯真的生命形式。这种生命在文化内涵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对于边城世界的这种类似“自然人”的生命形式而言,虽然对其非文化的生理本能的强化也可能消解了某种现代文化意识,但是人类现代新的文化价值问题危机的出现已是沈从文的前瞻。他深刻认识到现代社会生活与生存体验对生命发展的进化施加的不利影响,对现代文化的缺失性和局限性的反思体现了作者超前而深远的文化意识。如果说社会的现代转型开始要求个体生命对现代局限和异化的更高超越,现代人生形态应该出现崭新的样式,那么,他在描绘“自然人”充满纯粹本真等丰富人生意义的基础上,其作品也同样不时闪现社会长久的未来人生情形的曙光,也开始孕育健康发展的现代生命主体意识和独立意识。《边城》中男主人公最后的无奈出走“也许永远不回来了”,明确地象征着生存发展独立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并通过表达翠翠的迷惘思绪暗示着欲冲破某种陈旧生命意识而独立主宰自我命运的潜在愿望。生命主体自身开拓新的存在空间和实现新价值的愿望在一种恒常的时空中显现。

而沈从文《长河》中则明了地表达了湘西人类

生活与生命形式历史和社会意义上的“常”与“变”，是对现实生命态式的怀疑不满以及希望改变它们的强烈渴望的普遍情绪的体现，是面对现代和未来奏响的一曲改变人生现实、创造生命未来的乐章。我们由此可以领会到作家生命理想之所在。类似于《边城》的《三三》等作品里，理想人生的指向和象征意义则显现得更为明晰。其中作家笔下乡村生命象征的“山里水流”常常流向城市文明，象征着自然生命与现代理性必然的交合，乡村人生生动勇猛的活力与城市生命更新开放的潜力也可互相弥补融合。沈从文希望着“全个民族去掉不可靠的原人迷信，充实以一切合理的知识与技术，支配自然，处置人事，力求进步”[1]（《谈保守》，242页）。在这种认识里，作为与人生命运相关的现代认知与发展智慧等人本文化意义都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凸现。显而易见，如果翠翠、三三们接受了现代知识，激发起以理性反省观照人生后独立于社会的生命力量，便不再会如萧萧们“其生若浮，其死则休”般自生自灭，而会进一步成为自主自救且自新的现代青年了。

而社会与人生现代化的核心意义之一就是人类的生命和生存境况的彻底完善。造就美的“完人”或者说现代化的“完整的人”，也即成为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其途径一直是人们探索和思考的问题。在沈从文的创作意识中，乡村“自然人”生命的升华与城市人生的再造一样，二者在生命力量的本质上呈现出的意义指向是同一的，它们都是为未来现代人生观的展现提供希望之途。乡村与城市两种各有缺陷的生命范式都应不断地超越自身，其命运的彻底改变使完美的人生世态和生命价值与意义将显现：文明发达富强且人性素朴纯美。沈从文于其中表达出了明确的姿态：现代理性与自然人性的交融和互补将构成个体现代人生形式的基石。

尽管沈从文创作对边城乡村乃至都市生命形式的把握存在某种简单化倾向，但是“一切优秀成就一切崭新风格，都包含了作者全生命人格的复杂综合”[3]（《论特写》，137页），作家整个一生都信仰生命并热爱人生，进而不断对其形式进行独树一帜的深入的探索，并力求在现实生活中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的人生观”，使其“向抽象发展”并“追求兴趣和意志”，以此生命标准作为“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3]（《短篇小说》，115页）。此外，沈从文认为生活“若还有美处可言”，那么这“美处”便是“把生命

如何应用到正确方向上去，不逃避人类一切向上的责任”，所以“组织之美，秩序之美，才是人生的美”[1]（《〈小说月刊〉卷三期卷头语》，26页）。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在开放的文化视野里追求的完美生命历程其实是一个经历由低到高动态提升的现代化过程。即人类首先应具备自在的生命形式，“人在生命中的义利取舍符合人的自然本性……不为金钱、权势所左右”，其中渗透着鲜明的现代人文精神和个性意识。其次再由此上升为自为的生命形式，即“经理性与意志认识并驾驭人生”，达到“使生命从自在上升为自为”，其中怀有不断积极开拓进取的人生态度。再次是将这种自为生命形式努力“扩大到个人生活之外”，“粘附到这个民族向上的努力中”而“对人类远景凝目”[8]，其中包含着庄严的道德感、使命感和人生责任感，这种生命形式的发展已经和现代社会的长远未来发展紧密相联。沈从文对人生的探索与社会未来已经息息相关。作家生命理想的终极指向并非传统的独善其身，而是促进民族与国家的现代崛起和重建。

如果说民族现代社会文明的重建方式包涵着“离不了制度化和专家化”，“真正民主政治的形成”，以及“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3]（《读〈论英雄崇拜〉》，384页）等世界现代化内容，那么沈从文创作边城世界则主要对现代道德和生命意义作出探求。因而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探索的不足之处在于，作家在注意本土民族文化现代化特别性时把视野逐渐封闭了起来，没有涉及反映诸如西方现代质素等现代文化世界性的意义。但这种缺失是探求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边城世界这种民族性的过去历史情态，作为文明传统虽与我们现在的生活有观念相左之处和遥远距离，但这种“原人意味”的过去事实却仍然和现代人与社会“生出干系”。沈从文在为现代人提供了回复自然人性和活泼童心乐园的同时，从历史文化中向负累极重的现代文明发展提供了合乎人本的道德精神活力和生命模式的不懈探索。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努力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须的新观念”，而这些新观念“实在是一切现代文明的种子”[3]（《中国人的病》，351页），并在某一侧面成为具有崇高意义的“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设计”。在民族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缓慢进程里，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段落”的创作设计显赫了一种文学“新宗教”，表达了重建现代秩序和安顿人类

心灵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的意义大大丰富了古今现实描绘的真切体验和文学审美创造一致性的深刻内涵。沈从文的创作在这种“非同寻常的经营”意

识中颂扬着一切与他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1]（《〈篱下集〉题记》，34页）。

参考文献：

- [1]沈从文文集：第11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2]沈从文文集：第10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3]沈从文文集：第12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4]沈从文文集：第7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 [5]转引自：万俊人. 现代社会道德合理性基础论证[J].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6, (2).
- [6]沈从文选集：第5卷[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 [7]沈从文小说选：第2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8]李明颌. 虹与影：沈从文的生命理想[J]. 云南教育学院学报, 1994, (4).

Attempt at Modern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Remote World of Shen Congwen's Creation

WANG Wen-jie

(Humanities and Propagation Institute, Guangdong Busiuess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320, China)

Abstract: Shen Congwen, by his view of historical “chain”, builds his starting point of realistic reform consciousness on the deep cultural meaning of the correlation of the past and the modern, and take the future as the focus of attention of his rebuilding of “classical” cultural model of the remote regions. The expression of beauty and goodness of classical moral consciousness is permeated with the reasonable basis of modern ethics, of which “order and reason” in moral sense shows the link of the basic lowest and highest moral requirements of modern society. The display and thinking of man's life form in the remote regions reflect life's modern meaning and future possibilities, of which the enhancement and expectation ideal human life, together with its moral ideal is certainly to become the “seed” of modern soci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Shen Congwen; remote world; modern cultural 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唐 普]